啟程：走出自己的路

圓環上的歌聲

凌晨五點，天空尚在暗與亮的曖昧中，清冷的空氣裡陸續傳來大貨車發動引擎的聲音，劃破籠罩地面的寒意。這裡是屏東縣泰武鄉的平和部落，部落裡的許多男人從事建築業和貨運業，一天工作路程遠至高雄、恆春，甚至台東、台南。在灰藍色的天空下，只等引擎預熱完畢，就要出發。

隨著陽光露出頭，天空的顏色變得淺白，街道上的聲音也漸漸多起來，每天早晨最熱鬧的地方，莫過於平和部落的入口圓環。圓環的兩端通往部落內部的住宅區，另一端則與部落的聯外道路接壤，是部落族人上班、上學，出入必經之地，也是每天早晨最喧鬧的地方。

上班顛峰時間，許多車子陸陸續續駛出部落。幾位老人家開著被稱作「部落保時捷」的電動代步車緩緩駛近，小孩子站在座位前方的踏板上，把自己藏在 vuvu 的懷裡，只露出一個頭。遠處，還有老人騎著三輪車，身後的載貨箱上站著好幾個男孩，三輪車一靠邊，小男孩們用手撐住箱子的邊緣，從載貨箱裡跳出來，完美落地。

排灣語中，「vuvu」既代表阿公阿嬤，也代表著孫子孫女，老人和小孫子互稱 vuvu，當他們分開時，稚嫩和蒼老的聲音同時響起：

「vuvu 再見——！vuvu 再見——！」

孩子下車的地方，沒有醒目的招牌，或是鮮豔的塑膠滑梯。那兒有的是：小巧的桌椅，帶著輔助輪的小腳踏車，還有迴盪在空氣中的族語兒歌。一位部落青年和家長、孩子互道早安，幫孩子量體溫、噴酒精。有些孩子坐在小椅子上吃早餐、有些孩子在翻看繪本，還有孩子在玩玩具。

建築物外頭牆面是整齊的橘紅色二丁掛和白色水泥，依稀留著舊招牌因日曬差異留下的印痕。這裡曾經是部落裡的派出所，解編後成為閒置空間，如今部落的人重新整理，成了照顧孩子的地方。原本擺著茶几沙發的接待室，如今是大團體教室；值班台的位置，變成墊高的木頭平台，上頭擺著白板和音響；曾經的訊問室和拘留室，也鋪上木地板，變成上課的教室。

派出所的外牆上，掛著「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的立案證書。

社區互助教保服務？那是什麼？許多人在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時，心中會升起疑問。

談到幼兒照顧，我們腦裡浮現的是宛若城堡的幼兒園、琳瑯滿目的雙語課程

和才藝課程。談到社區工作，我們會很快聯想到發展社區的特色產業、媽媽教室，大學教授帶著學生來社區訪調、學習文化……

無論哪個畫面，好像都跟「照顧幼兒」搭不上邊。

時間拉回 20 年前，在平和社區發展協會擔任總幹事的德布藍恩，她就在一個念頭間，把這兩個詞連在一起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讓她萌生念頭的原因，居然是社區裡的老人。

民國 96 年，平和社區發展協會申請了老人關懷據點，讓老人每個禮拜來活動中心聚在一起聊天、做手工。德布藍恩觀察到：許多來關懷據點的長輩，身邊總是帶著小孫子，有些甚至帶兩、三個孫子。

部落裡的一位 vuvu 林秋葉，每天把孩子放在三輪車後面載著走，德布藍恩問：「秋葉 vuvu，妳有沒有時間休息？」，秋葉 vuvu 無奈的回應：「怎麼可能休息？我 24 小時都要帶著他，我去看病要帶著他，去上廁所也要帶他，去田裡還要把她背在身上工作。」

原來，因為平和沒有幼稚園，雖然隔壁的部落有鄉立托兒所，但收的孩子不多，沒有多少名額可以給外村。部落裡，有經濟能力的家長將孩子送到外面的私立幼兒園，也有些孩子沒有上學，當家長外出工作時，就將孩子留給長輩照顧。畢竟，上私立幼稚園的費用不便宜。因此，許多老 vuvu 不管是要去田裡，或是來關懷據點，都要帶著孩子，無形間少了很多自由，沒辦法喘息。

德布藍恩思考著，如果有一個地方可以照顧部落的孩子，vuvu 們就能夠休息一下了。

「如果能把這些孩子聚起來，一起吃飯、唱唱歌、畫畫圖，該有多好！」德布藍恩想，這件事不會太困難。她剛回部落的時候，就在自己的娘家帶著一群國小孩子讀繪本故事跟畫畫。屋子小小的，但孩子們很會利用空間，尋找自己舒適的位置和姿勢，有些趴在地板，有些鑽到桌子底下，原本略嫌擁擠的客廳一下子變成魔術空間，塞得進十幾個孩子。

當心裡動了照顧孩子的念頭，就對相關訊息特別留心。隔年年初，德布藍恩在辦公室查看公文信件時，看到一封公文，寫著「原住民族地區幼托服務暨保母訓練與輔導試驗計畫」，上面的關鍵字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德布藍恩打開公文，仔細閱讀，她發現這個原民會的試辦計畫，是要訓練部落的婦女成為保母，在村莊照顧幼兒。德布藍恩心想，這個機會來了！

不斷搬家的幼兒園

在德布藍恩收到公文的同一天，距離平和半小時車程外，位於瑪家鄉三和村的美園部落，幾個婦女正為了同一訊息而歡呼。她們不敢置信的交頭接耳，上帝真的聽見她們十年來不間斷的禱告，應允了她們的祈求。

電話響起，為首的婦女接起電話，話筒另一端是當時的屏東縣原民處科長馮珮玲，她劈頭就說：「馬老師，妳一定要來聽計畫說明會，這個計畫對你們太重要了！」

接電話的婦女，是美園部落族人稱為「馬老師」的馬秀辛。

馬秀辛的母親是在美園部落長大的魯凱族，父親則是排灣族。馬秀辛作為家中長女，在不同村莊間來回移動、照顧年幼的弟弟，是她的童年日常。高職畢業後，馬秀辛一邊在高雄的幼兒園當助教，一邊去師專修習幼保學分班。

民國 84 年，馬秀辛重新回到母親所在的美園部落，三十出頭的她，已是經過外面歷練，有能力營運幼兒園的「馬老師」，準備在部落一展身手，借用舅媽的房屋，在部落開設托兒所。

托兒所開設第三年，許多原本在都市工作、全家住在都市的族人，紛紛搬回三和村，村裡的孩子也多了起來。

馬老師一開始看到許多青壯年的族人回到部落、孩子跟著變多，感到非常高興，畢竟人多錢就多。沒想到收學費的時候，只有一半的孩子繳回學費袋。許多大人交不出錢，甚至不敢進來，把孩子放在路口要他自己走進園所。

當時和馬老師一起工作的部落婦女林美惠曾經回憶，那段日子托兒所的經營非常艱苦，時只要有學費袋進來，就要先把這個月孩子吃飯需要的買菜錢先抽出來，剩下的錢兩人平分。每個月的薪水有多少，就看學費袋抽出買菜錢後還能剩下多少。

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托兒所的經營難以為繼，馬老師考慮把托兒所停掉。一天中午，托兒所二十八個孩子躺在地板上午休，馬老師和一起幫忙照顧孩子的教會傳道討論著：如果托兒所關了，這些孩子會去哪裡？兩個人用手點過一個個孩子，這個會去哪裡、那個會去哪裡……

算完一輪，兩個人下了結論：「還是再開一年好了。」

原來，那幾年住在桃園、台北的族人紛紛回來，是因為失業。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觸發台灣本土的金融風暴，導致房地產進入黑暗期，許多建商倒閉，原本在都市作板模、鐵工的族人沒有工作，只能回到部落。

部落裡雖然有土地，但族人年輕時就到外面以體力勞動工作謀生，沒有務

農的技能，經濟陷入困境，情緒也滿是挫折焦慮。那些日子裡，街上不時可以見到有人因鬱悶而在白天喝酒，也不時聽到斥罵孩子的聲音。

考量大人的情緒和壓力，如果停托，孩子只能待在家裡，可能得不到好的照顧。馬老師同時看見另一個問題：偌大的三和村，居然沒有別間托兒所。

馬老師托兒所裡的孩子，主要來自三和村以及美園部落南邊的日新村。三和村是民國 40 年代在政府的集團移住政策下形成的移住部落，當時國民政府開墾隘寮溪的河床地，鼓勵霧台、三地門、瑪家等三個原住民鄉的原住民族人移入屯墾，這些聚集起來居住的族人，形成今日位於平地鄉中的原住民村落，包含北邊的玉泉社區、中間的三和社區，以及南邊的美園社區。

三和村匯集了來自三個原鄉的族人，村里人口眾多，卻連一個可以照顧孩子的地方都沒有。馬老師察覺到，部落的孩子不像都市，有許多不同模式的幼兒園可以選擇；部落的托育服務也和都市幼兒園追求營利的經營邏輯不同，畢竟，部落的托兒所不可能因為孩子繳不出錢就拒收，比起賺錢，更像是部落家庭所需要的基本照顧。

馬老師向社區發展協會提議，由社區發展協會擔任經營者，在社區活動中心設立托兒所，讓托兒所變成公共的。如此，就算自己未來放手，別人還可以繼續經營下去。這個提議獲得了社區理事們的支持，原以為一切可以順利進行，但當馬老師去社會局申請立案時，才發現在第一關建管處，就規定托兒所的經營人必須要有建築物的產權，但活動中心的產權屬於鄉公所，怎樣都不可能變成社區發展協會的。

既然活動中心行不通，馬老師轉而思考用自己的娘家來申請設立托兒所，娘家屋舍是鋼筋水泥建築，也有使用權狀，旁邊是農田和芒果園，有充足的戶外活動空間，一切都再理想不過。爸爸還在隔壁自己蓋了一棟寬敞的鐵皮屋，想著要做小朋友的溜滑梯。一切都再理想不過。

準備立案期間，馬老師也去考了立案所需的所有證照：廚工需要的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執照、消防署規定的防火管理人證書、開娃娃車要用的營業駕駛執照、也去上了園長學分班……。

查核時刻，建管、消防，相關部門的人都來了。馬老師聽著查核人員的評論，才發現這棟已是她心目中最理想的屋舍，在法規定義中還是不合法。鐵皮屋沒有建築使用執照，那就是違建。建管處建議：你們不如把鐵皮屋的屋頂掀了，讓它變成戶外空間，才可以符合法規，否則就必須取締。

「這是我爸爸花多少錢蓋的，是我們的家，我們哪有本錢說掀就掀？」馬老師回想起這段經歷，不管過了多久都還是覺得委屈。

那時托兒所的桌子椅子書櫃，大包小包零零總總，才都剛剛搬進去布置好，

因為不合法，馬上又得全部再搬出去，所有人既疲憊又痛苦。

日後一數，那幾年托兒所搬家的次數竟多達二十幾次，在部落持續尋覓空間，搬過部落族人出借的民宅，教會也願意出借教室，但都面臨不同的問題。讓情況變得更糟的是：馬老師向社會局申請設立登記的舉動，原本遙遠的政府系統知道了「這個村莊有人在收費照顧幼兒」。在法規的邏輯裡，未立案的托兒所，就是違法經營。

馬老師面臨兩難：一邊是部落每年都有三十幾個孩子想要進托兒所，需求就是那麼多；另一邊是照顧幼兒的「營業行為」如果被發現，將面臨被社會局開高額罰單。艱難的日子裡，唯一值得寬慰的是部落族人很能同理托兒所的難處，不但幫忙托兒所搬家，也會幫忙打掩護。如果有社會局的人來問，大家都眾口同聲「已經收了！」

民國 97 年 2 月，這個之後被稱為「部落托育班」的原住民地區保母暨托育實驗計畫，在屏東的原住民文化會館舉辦說明會。平和的德布藍恩、美園的馬老師，還有許多社區發展協會的人都出席了。

原民會當時的衛服處社會福利科科長親自下來主持說明會，她開宗明義的闡釋：部落托育班計畫的核心精神就是「找部落婦女來照顧部落孩子」，補助部落婦女參加為托育人員培訓，考得保母證照後，便可以在部落內以小團體的方式照顧孩子。

會議室中，德布藍恩開始在心中盤點部落哪些婦女可以成為保母，她想照顧部落孩子的願望，將會透過這個計畫再前進一點，因此充滿幹勁。

彼時，德布藍恩與坐在會議室另一邊的馬老師並不相熟，但就算十幾年後，德布藍恩對馬老師在會議室裡的第一句發言依然記憶猶新：「我等這個計畫非常、非常久了」。馬老師在這場會議中記得最深的，則是自己止不住的眼淚，她想到這幾年帶著部落孩子躲躲藏藏，這麼多年的困境，如今總算看見了一條出路。

德布藍恩和馬老師當時沒什麼互動，她們只是略為知道彼此都有在做社區工作。說明會上，她們沉浸在各自的美好願景中，還不知道這個計畫即將在執行短短兩個月後驟然生變，而她們即將成為戰友，為了照顧孩子展開漫長征途。當時，她們也還不知道，未來會有更多人、更多社區加入她們的行列，為偏鄉打開一條不一樣的照顧之路。

照顧如何「不合法」？

說明會後，大家紛紛回到社區，開始為設立托育班做準備。

除了美園已經有馬老師的托兒所做基礎，大部份社區都是從零開始，德布藍恩所在的平和社區也不例外。德布藍恩開始在社區裡「找人」，首先是找孩子，盤點社區裡有多少三到五歲的孩子，還有哪些一到二歲的孩子明後年也會進來。再來要找老師，德布藍恩開始打聽社區裡有哪些人是幼保科畢業，或有保母證照？還有哪些婦女是在家裡照顧孩子，沒有到外面工作，這些都是可能的人選。

德布藍恩透過村莊的人介紹，找了幾位年輕人。其中一位是從外村嫁來平和的年輕媽媽莊璉貞。因為要顧孩子，璉貞總是待在家裡，年紀又比德布藍恩小很多，平常兩個人在部落交集不多，這樣的深談還是第一次。

「我沒有經驗，這樣真的可以嗎？」聽完德布藍恩的介紹，璉貞有些遲疑。璉貞高中念幼保科，她在私立幼兒園實習時，被園所當成打雜的人力，沒有多少機會實際練習教學，是段不甚美好的回憶。畢業後，璉貞跟她先生一起在工廠工作，沒有繼續往幼保發展，對於德布藍恩的邀請，她雖然心動，卻沒什麼自信。

德布藍恩給了肯定的回應：「我也沒有經驗啊！大家都沒有經驗，我們就一起試試看！」

德布藍恩為平和托育班規畫的藍圖裡，除了孩子，婦女也是她想要培養的對象。她知道部落有不少女性很年輕就要帶孩子，沒有太多機會到外面歷練，甚至可能在成長過程裡，沒有被啟發認識自己的能力和能耐。部落托育班不只是給孩子受照顧的機會，也是為了像璉貞這樣的婦女有成長、學習的機會。

除了璉貞和幾位年輕婦女，德布藍恩也拜訪了村莊裡有資深幼教經驗的族人潘秀慧老師。德布藍恩的構想是，讓資深老師可以成為「老師的老師」，帶領其他新手老師成長，在社區培養出更多照顧孩子的人。

隨著入學的孩子和老師陸續確定下來，社區發展協會如同準備迎接新生兒的家庭，大家一起去市區挑選書櫃，購買適合孩子的桌椅、繪本玩具。一番佈置下，派出所原本略顯冰冷的辦公空間，變成充滿兒童氣息的空間。

托育班的成立，讓部落產生許多化學變化，原本在多數族人上班後，部落白天的街道就會安靜無比，現在充滿孩子的啼哭聲和笑聲。活動中心前的廣場，是孩子戶外遊戲的地方；部落出口處的圓環石碑，成了孩子們唱歌的舞台；傍晚，許多家長下班後接了孩子並不急著回家，坐在派出所前面跟老師閒聊。讓人覺得空氣裡的氣氛都變得不一樣了。

托育班的老師編出讓孩子朗朗上口的母語歌，部落家戶習慣晚上在屋外吃飯，飯席之間，孩子們唱出在托育班學的歌，鄰近的小朋友彼此合音、越唱越響

亮。毫不誇張的說，那時到了傍晚，不管身處在部落的哪條巷子，都能聽見孩子的母語歌聲。

小朋友開始講母語，在部落族人間產生很大的迴響，尤其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孩子說族語的長輩，更是十分驚喜。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著自己的開心和感激：有些長輩帶來自己養的雞下的蛋，有些長輩帶來蔬菜和南瓜，有些長輩來幫托育班門口的花圃除草。

德布藍恩看著老師帶著托育班的孩子走在街道上，與老人家打招呼，觀察部落的街道正在曬什麼作物？社區的人在忙什麼？原來，隨著季節不同，部落的人家屋門口曬的東西也會不斷變換，秋天是咖啡、冬天是樹豆、夏天是小米，這些東西明明就在街道上，但她回部落工作這幾年，居然都沒有留心過。

德布藍恩發覺，一開始是為了減輕老人和家庭的負擔而申請托育班，但當這些孩子留在部落，由部落的人帶領，發生的種種變化，遠比她期待的更多。

驟然生變的四月

97 年 11 月，美園托育班和平和托育班正式成為屏東第一批成立的十個托育班之一。對平和來說，幼兒照顧是令人充滿期待的新開始；對美園來說，馬老師和她的同事不必再苦等時有時無的學費袋，能開始「領薪水」，那份穩定安心、不再憂慮生存的感覺，是從未體會過的。

然而，11、12 月過完，社區在年底送出下一年度的計畫書，也收到了原民會的核定，卻遲遲沒有撥款。大家原本以為只是公家機關動作比較慢，但過完年了、2 月過完了、3 月過完了，眼看著 4 月也即將要過完，整整四個月都沒有核撥經費，連小朋友每天吃飯的菜錢都是協會先貼。托育班才穩定了兩個月，頓時又掉入了捉襟見肘的處境。原民會出了什麼事？為什麼突然就沒經費了？大家不斷打電話詢問原民會，卻始終沒有得到一個肯定的答覆。

4 月底，原民會突然帶著內政部兒童局和教育部來到屏東，要訪視部落托育班。來的公務員位階都很高，包括原民會當時的衛福處副處長、內政部兒童局長，以及教育部的官員。所有人都很興奮，認為長官來訪，就是托育班會繼續穩定執行的訊號。

在訪視的過程中，德布藍恩卻隱約感覺到現場氣氛不太對。長年社區工作的經驗，讓她對行政官僚的態度十分敏感。德布藍恩觀察到兒童局官員面對老師和孩子的賣力展示，始終毫無表情、不置可否，猜不出心裡在想什麼。

送走兒童局官員，疑惑還沒有卸下，下午原民會突然又打電話進來：「現在趕快來安坡部落，我們要召開會議！」安坡部落是訪視的最後一站，離平和將近

一個小時車程，原民會突然要大家馬上就到，完全沒有再做任何說明。

大夥匆匆忙忙地趕到安坡，兒童局拿出一份「山地托育班設置原則草稿」一條條唸出來。兒童局要求所有部落托育班只能營運到六月底，六月底後如果還要繼續營運，就要符合這份新的「設置原則」，經過兒童局審查核可，才能繼續經營。眾人不明就已，但也只能先接受下來。

德布藍恩和社區發展協會的同事們回去後，準備照著設置原則的要求修改，才發現這份新出現的「山地鄉托育班設置原則」裡，有些陳述看起來只是幾個字的差別，但經過主管機關的解讀詮釋，變得完全超乎社區對常識的理解。

讓大家腦袋當機的其中一件事，是關於「馬桶」。

托育班原本的作法，是像一般有幼兒家庭的做法，小孩子想上廁所的時候，就在成人馬桶上放鴨鴨輔助便盆給孩子坐，孩子用完後再把輔助便盆拿掉。如此，大人小孩都可以使用馬桶。

新頒布的設置原則中，規定「部落托育班應具有符合該年齡層兒童使用之衛生便桶」，所有人都覺得沒問題，馬桶當然是幼兒可以用的呀！然而，經過衛生局承辦人解釋，大家才知道這句話真正的涵義：必須設置二十五公分高的兒童專用馬桶，才算「符合該年齡層兒童」。

「如果安裝兒童專用馬桶，那其他人要在哪裡上廁所……？」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夥伴彼此面面相覷。

在社區，除了要照顧幼兒，還有國小課後班、部落青年會、老人照顧據點，村辦公處，或是社區居民組成的興趣團體，都是會使用社區空間的人。社區裡的設備是公共資源，應該要善用既有的空間，大家一起討論協調彼此的需求，讓所有人都可以共同使用、分享。

但是，在政府的邏輯裡，如果這個空間有在做幼兒照顧，那設備和空間就必須是「幼兒專用的」。

如果要保留原本的馬桶，就得另外安裝幼兒專用的廁所，既有的管線配置都要重新規劃，涉及的經費和時間，對一個社區來說非同小可。況且，部落與市區之間距離遙遠，相比於市區，更不容易找到專業的施工師傅，施工的檔期也往往被排到「有空再說」。

最讓人感到焦慮的，還是政府部門模糊不清的態度。托育班計畫原本說好是一年一審，如今才做了半年，就突然改口要用新規定，否則就要提前終止。就算社區發展協會想辦法籌錢，把所有設備修改到符合規定，但這樣做，真的就保證之後可以穩定經營嗎？還是到時候會再出現其他新的要求？德布藍恩還聽到傳聞，托育班計畫被認定違法，就算通過兒童局的核可，最多也只能再做一年，

政府只是在找個時間點，準備要退場…

當時是民國九十八年，原住民族教育法的施行細則剛通過不久，教育界與學界還在摸索「原住民族教育是什麼樣子？」，平和部落的族人們已然親身感受到讓孩子留在部落受照顧、學習部落的事情，所發生的種種變化。部落裡實際發生的景象，給了德布藍恩底氣，她相信「這樣的照顧是對的，我們不要輕易放棄！」

照顧者的結盟

安坡會議後，德布藍恩和她的同事兼好友，當時在平和擔任社區課後照顧老師的楊江瑛，兩人徹夜討論著接下來的對策。

「一個人一定沒有力量，很多人集結才有力量，作社區工作，就是要集結大家。」這是德布藍恩在社工裡學習到的事情。大學畢業後，她在一些社區的抗爭現場裡，見證過社區裡不同力量的結盟，多線並進的力量遠遠大孤軍奮戰。因此，德布藍恩和楊江瑛放在行動計畫最前頭的，便是「要出去找夥伴」。

兩人的第一步，便是去拜訪其他托育班，屏東一共有十個社區申請托育班，其他申請托育班的社區怎麼想？又打算怎麼應對？

時光倒回民國九十八年，當時 Facebook 剛開始在台灣流行，更沒有 line 可以加，德布藍恩跟楊江瑛打定主意，花了好幾天的時間，親自一個一個拜訪其他有做托育班的部落，了解他們的想法：有些社區希望可以繼續照顧孩子，但實在沒有財力周轉，要撐不下去了；有些社區認為這只是承接一個政府的計畫，如果難做就收掉沒關係；也有些社區是由外來的協會經營托育班，要繼續營運或者收起來全由協會決定，社區的人無從置喙。

在拜訪美園前，德布藍恩就常常聽到當時托育班的承辦人，屏東縣政府原民處的馮珮玲科長強調：「你們一定要去找三和村美園社區的馬老師聊聊！」直到這次拜訪，德布藍恩、楊江瑛和馬老師終於第一次見面。沒想到，三人一聊起來，便欲罷不能。

「我們一直互相說『對對對！就是這樣！』」，楊江瑛回憶起三人第一次見面時一見如故的熱絡，「我們怎麼這麼像！你們講的都是我們遇到的。」聊完一輪，大家不禁感慨。

從許多面向來看，平和和美園是兩個很不一樣的部落。平和是排灣族，美園是魯凱族；平和部落位於北大武山山腳，與市區有一段距離，而美園部落坐落在平地城鎮內，周邊是熱鬧的市區；平和是來自單一起源的部落，美園則是八個原鄉部落族人遷移形成的「魯凱共和國」。除了語言不一樣，祭儀文化、歷史脈絡以及地緣位置也有許多不同。

如果談到在部落照顧孩子的經驗，兩個部落的遭遇卻又驚人的相似。

讓德布藍恩動念想做托育班的，是老 vuvu 背上 24 小時黏著的小 vuvu；而馬老師始終沒辦法放棄「地下托兒所」，也是因為她知道如果她不做了，部落的孩子就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當平和原本的派出所空間，被政府認定不適合作托育班時，部落族人願意無償提供自己新建的鐵皮屋給托育班使用；馬老師在為托兒所努力尋覓合法場所時，部落的教會、社區發展協會都願意提供空間，也有村民提供自己的家。當托育班搬家時，村莊的人總會一起出來幫忙，沒有人置身事外。

還有，部落的人彷彿托育班的隱形照顧者，有人幫部落的孩子做玩具，有人送來自己種的蔬菜水果，老人家帶著孩子進到自己的田裡……許多讓人感動窩心的舉動，講都講不完。

首次結盟

這次見面，從下午兩點一路聊到晚上，原本還有些模糊的念頭，在三人的心裡明朗起來。

「我們要爭取讓托育班繼續經營下去，不要輕易放棄。」不只是因為部落族人太需要照顧孩子的地方，更是因為這些日子裡，她們慢慢察覺托育班不只是「一座在部落裡的幼兒園」，當孩子們能夠留在部落裡被照顧，有許多小小的化學變化便會開始發生。

「我躲在地下這麼多年，終於等到這一天，可以站在陽光下照顧部落的孩子，我絕對不要再退回去了。」馬老師經歷過十四年難以合法、必須躲起來經營的辛苦，她深知這次機會如此得來不易，錯過了也許就不會再有。

「雖然我們現在困難重重，總比當時好。以前只有美園一個地方在喊，現在有更多社區，我們當然要大聲的喊！」

在這次見面後，美園和平和組織了幾次會議討論接下來的行動，除了德布藍恩、楊江瑛和馬老師，其餘第一線的老師們也在課餘時間一起參與討論。

大家想著，為了要行動，除了一個個托育班的名字外，還要有個共同的、可以代表大家的名義。

我們共同的名字要叫什麼呢？大夥七嘴八舌的討論著。

「我們要不要組一個協會？」

「組協會太繁瑣了，有很多流程要跑，光成立就要好幾個月。」

「叫自救會好了！部落托育班自救會？」

「好像有點太偏了，我們不是只要救托育班，我們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讓政府知道，讓孩子能夠在地被照顧有多麼重要。」

「對，重點是照顧的精神，我們不是用商業的想法做照顧，不是真的只在社區裡開一個托兒所賺錢而已。」

「這是互助的精神！我們在作的，就是以前村莊裡一起照顧孩子。」

「我們是不同部落，但我們有共同的盼望、共同的夢想……。」

「最好還要有點激進，我們就不要當聽話的乖寶寶！」

就這樣，在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中，「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誕生了。這麼長的名字，放的全是大家覺得超級重要、一定要放進去的信念。

「互助」，要彰顯部落裡族人互相幫助的美好價值。

「托育」，是集體養育、照顧孩子。

「行動」，表達不輕言放棄，將要為此積極戰鬥的力量。

第一個詞「部落」，和最後一個詞「聯盟」，代表的正是這些有相同理念和夢想、希望在地照顧孩子的部落，彼此結成同盟。

聯盟誕生後，夥伴們也有了一些分工的想法：相對於要每天照顧孩子的老師，德布藍恩和楊江瑛比較有餘裕能夠自由移動，她們會往外尋找更多支持跟資源，將訊息帶回給平常要現場的老師們，與大家一起討論。經過共識後的行動，便會以「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的名義發出。

平和的老師也提議，除了討論對政府的倡議活動外，大家也來做教學和照顧的交流吧！老師們不定時地用課後時間聚在一起，討論在班級裡遇到的困難，或是分享覺得不錯的教學經驗。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的隊形，便在一次次的戰鬥準備，還有日常交流與支持中，慢慢地充實起來。

駛在照顧的長河上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的辦公室裡，有一張長長的橫式地圖掛畫。這張掛畫平時是捲起來的，如果想看見畫的全貌，要用一隻手壓住畫紙攤開的部分，另一隻手抵住畫軸往前推，才能一點一點的把畫展開。

隨著畫漸漸打開，許多不同角色陸續出現，讓人聯想到童年的遊戲：手指按在捲起來的地圖前，一點一點地將畫紙推開，慢慢走進地圖深處。有時面臨路線的分叉點，有時發現自己走進死胡同，有時兩條線匯集成同一條繼續往下走……接下來的路怎麼走？會有地雷或禮物？在地圖被揭開之前，一切都不得而知。

不同的是，這張地圖裡沒有拿著劍的勇士或噴火的怪獸，地圖的最前頭，畫的是忙著採收作物的農人，農人的身旁有許多孩子，有些孩子在玩鬧，有些在幫忙煮飯，還有些孩子正在照顧更小的孩子。隨著畫軸打開，教會也出現在路旁，穿著修女。再接下來，田地變成建築工地，農人進入都市，戴上黃色的工地帽，走入工廠和搭著鷹架的建築工地，孩子們排隊走上娃娃車，駛向宛如城堡的雙語幼稚園.....

這幅畫的作者是楊江瑛，她所畫的，正是台灣幼兒照顧的「來時路」。

照顧為什麼消失了？

自從德布藍恩和楊江瑛踏上爭取在部落照顧孩子的路程，隨著時間移轉，走過越來越多地方，她們漸漸察覺，無論是美國、平和，還有許多偏鄉社區的人，他們的童年都有著一幅受照顧的景象，存放在記憶裡。

「以前，部落托兒所在籃球場附近的集貨場，部落 ina 帶我們唱歌跳舞、吃點心，就這樣過一天。後來集貨場沒有了，我們就改去教會唱詩歌、聽傳道講故事。」

「小時候，所有沒事做的小朋友會被聚在集會所，畫畫、聽故事，玩遊戲。我們最喜歡領牛奶的時間，所有小朋友拿著杯子排排隊，阿姨從大鍋裡一杓杓舀出熱牛奶給我們……」

「我們村的托兒所設在寺廟的邊廂。天沒亮，家裡的大人和大一點的哥哥姐姐已經下田工作，我自己從家裡走到托兒所。走過去只要十分鐘，但路上很多好玩的東西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吃果子的小鳥、溪邊的小魚……」

那些記憶十分多樣，卻又有著鮮明的共通點：孩子聚集的地點可能是教會、寺廟、集會所，或甚至只是依傍著大樹搭建的棚架，但一定是離家很近、走路可到的地方。照顧孩子的人，可能是教會傳道、農會或村辦公處的職員，誰家的姐姐、媽媽或阿嬤，但一定是生活裡熟悉的人。

這些在地、熟悉、親近的照顧，是在什麼時候消失了？又是什麼時候開始，人們對「幼兒園」的印象逐漸置換成鮮黃色的娃娃車，和周邊環境毫不相干的城堡建築，私立幼兒園各項琳瑯滿目的收費，還有要為了中籤機率搶破頭的公幼名額？

在尋找外援的過程中，楊江瑛和德布藍恩認識了創立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的園長簡瑞蓮。瑞蓮不但是園長，也是教保工會的社會運動者，她為德布藍恩和楊江瑛分析台灣幼托的局勢，兩人像是變成一塊大海綿，開始大量吸收台灣幼兒照顧的歷史。許多疑問，也在瑞蓮的娓娓道來裡慢慢地被梳開。

曾經，台灣的許多社區都有托兒所，農村社區在農忙時期設置短期的「農忙托兒所」，利用集會所或廟宇裡照顧孩子；原住民部落也在基督教芥菜種會的推廣下，設立教會托兒所，培訓部落婦女成為保母，這也是部落中年人童年記憶中排隊領牛奶，由傳道帶領著唱教會歌的由來。

當經濟模式轉變，越來越多人從農田走進工廠，密集勞動的時間不再僅限於農忙期，為了支持家庭的大人可以安心工作，許多村莊都由鄉公所設立「村里托兒所」，托育的時間也不再只限於農忙期，讓孩子可以每天就近受到照顧。

隨著社會發展，幼兒照顧開始進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私立幼兒園數量逐漸增加，政府訂定一系列管理規範，成為衡量照顧「品質」與「安全」的標準。然而，當這些標準平行的移置到台灣各處，卻忽略了偏鄉既有的現實條件。

以最基本的照顧空間來說，社區托兒所多辦借用社區活動中心、廟宇、教會等場地做幼兒照顧，當「建築法」修訂，開始嚴格規範各類建築物的用途，社區既有的建築因年代較早，紛紛面臨沒有建築使用執照[1]，或是難以申請使用執照、難以變更建物用途[2]等困境。

「沒有使用執照」或「無法變更使用執照」不代表建築物一定有危險或環境不佳，但在法規邏輯裡，就成了「不合法的照顧」[3]。如果想將空間修改到符合法規，無論是資金或專業知識，都有相當高的門檻，讓一般村里社區難以負擔。在缺乏配套措施的情況下，曾經遍布在全台偏鄉村里的托兒所，最終陸續走上了

---

[1] 台灣許多農村社區的社區活動中心、集會所等場地，多集中於民國 60-70 年代建設，當時建築法相關法規尚不完善，也較無申請使用執照的觀念。

[2]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中規定不同類別的建築物限定用途，若原本並非專用於照顧托育用途的建築物(F3 類組)要做幼兒照顧，需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照需要所有權人同意，但許多社區建築物因建造年代較早，建物產權持份可能非常複雜或者找不到人，導致難以辦理變更，遑論改建。

[3] 99/11/03 監察院「監察院對公立托兒所環境安全及管理問題調查報告」(調查案號 099 內調 0102)：截至 2010 年 6 月，國內公立托兒所共 1,177 所，「已合法」領有托兒所使用執照者為 370 所（31.4%）、所在位址雖屬合法建物但托兒所用途與使用執照登載用途不符，屬「違規使用」者共 331 所（28.1%）、因早期建物「無使用執照」者則有 476 所（40.4%）。雖建物肇建時期較早，無使用執照或用途類別不符規定，不必然即顯示該址建物硬體結構有危險或環境不佳，但均屬「違反現行建築使用管理規定」之行為，合計有 807 所（68.6%）

整併或者裁撤的結局。

逾淮為枳的橘

「原來，我們曾經擁有的照顧，是這樣消失的。」

隨著線索一一拼貼，眾人將自身記憶和歷史逐漸核對起來，竟有了不寒而慄的感受。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成立後，平和、美園兩個部落的老師，便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也會經常聚在一起。由於楊江瑛和德布藍恩不是第一線老師，時間比較彈性，她們成為托育聯盟的「移動組」，到各地參加跟幼兒照顧有關的研討會、公聽會，把握每一個可以發聲的機會。在兩個班的聚會上，她們將在外接收到的資訊、政策風向轉達給老師，這些訊息往往能和托育班現場的經驗互相映證或對話。

「這樣的事情，我也有遇過！」當德布藍恩和楊江瑛向將瑞蓮園長的分析分享給老師們，馬老師馬上聯想到她申請立案時遇到的「防火牆」事件。

「消防安全」是幼兒照顧空間裡非常重要的項目，火災時能快速、順暢逃生是第一要務，美園社區活動中心的大門正對著風雨球場，出入方便，一向被大家視為安全的空間。但當馬老師以社區活動中心去申請設立幼兒園，才發現在法規邏輯裡，風雨球場因為有全遮的雨棚，在消防法規的定義中便是「建築」，活動中心大門和風雨球場變成兩個相鄰的建築，必須蓋一座防火牆，才符合消防法規的規範。

建築師建議馬老師，不如把活動中心的大門封起來，以符合『防火隔間』的規定，然後另外在原本是牆的地方開一扇門供人進出。但是這樣做真的有讓建築更安全嗎？原本活動中心如果發生火災，大家可以直接從大門跑出來，逃到空曠的球場，「防火牆」反而妨礙了直覺的逃生路線。

「當我一條條閱讀法規，發現裡面對建築的定義，無開口樓層的、六樓以上的、十一樓以上的.....這些敘述離部落好遙遠，更像是對應都市裡的高樓大廈、車水馬龍，而不是我們的樣子。」馬老師一句「不是我們的樣子」，點亮了大家心裡有些模糊的感受。

德布藍恩想到，平和遇到法規要求托育班的大部分設備都要「幼兒專用」，是不是也預設了都市的樣子？不論是學校附設的幼兒園，或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立幼兒園，都有獨立編制和專用空間。但社區裡的空間是大家共用的，從最根本的地方，就被排除在法規外了。

這一路走來，部落遇到的問題不只是沒有建築使用執照，而是許多規範都

以都市空間作為預設。中文有一句成語叫做「化橘為枳」，同樣的果實種在淮水以南是甜美的橘子，可是一旦越過淮水，便會成了酸掉牙的枳，幼照法規似乎就像那樣的果實。都市裡，建築彼此緊密相接，空間密閉狹小、動線複雜，然而，偏鄉社區的空間條件和都市完全不同，法規卻沒有因地制宜，而是一律以同樣的標準要求大家遵守。這些標準放在社區裡，不一定能讓空間變的更安全，卻為孩子的在地照顧帶來非常大的阻力。

「社區現況就是有很多孩子沒辦法被收托，像我們平和社區，隔壁武潭部落、佳平部落都有公托，但光收當地部落的孩子就額滿了，我們的孩子要到五歲才可能有名額，兩、三歲的孩子幾乎沒有機會。」

「美園部落是魯凱族，但周邊並沒有任何可以提供孩子學習文化的場所。我們的周邊都已經是平地村落了。我希望，我們的孩子至少要能夠在部落度過童年……」

「我妹妹嫁過去的部落離學校很遠，在娃娃車的路線裡是第一站接走、最後一站送回來，孩子一天光是待在娃娃車上的時間就要一個半小時.....這樣的照顧品質，真的對孩子比較好嗎？」

當托育班被貼上「不合法」、「不合格」的標籤時，有些人害怕違法、有些人自責「我們是不是不夠好？」、「我們就是不專業！」。

一旦自身的處境有了歷史的縱深，以及跨越部落的寬度，大家逐漸意識到：我們現在的遭遇，其實就是過去偏鄉托兒所的遭遇——不是我們不合法，而是照顧孩子的法規，從來沒有看見部落的條件和需求。

伴隨著意識的察覺，想讓照顧繼續下去的動能和使命感也逐漸滋長。

美園部落的怡倫老師，是部落的青年，也是美園申請托育班後的第一批老師，她利用歷史照片素材，將美園托兒所十幾年來四處搬家的歷程製作成短片，讓外面的人更可以理解美園的故事。

老師們也彼此決議，因應政策不穩定，大家將薪水的一部分提供做為共同基金，讓托育班如果又像年初那樣突然停薪，或突然增加哪些修繕的要求，能在資金上有一些周轉的空間，不至於馬上斷炊。

在地照顧孩子的權益，本就是我們曾經擁有的東西，在社會的進程裡，被快速發展的社會推擠到邊緣，而後悄聲消失。部落托育班出現，讓大家有機會再一次扣住原本已經關上的大門。如果錯過，這樣的機會也許再也不會有。

過去曾經擊倒偏鄉托兒所的，如今我們能贏回來嗎？

等在眼前的，也許是一場很漫長的抗戰。

但這場抗戰的結局，會決定了畫卷的最末端，是什麼顏色與風景。

vuvu，我們用自己的話來說！

時間快轉到九十八年的七月二十五日，這天是星期六，對於平常總是充滿人潮與聲音的活動中心而言，應該是難得清閒的寧靜早晨。

然然，這天一早，陸陸續續有人來到活動中心。這些人裡，有帶著幼兒的年輕媽媽，帶著孫子的中壯年男人和婦女，走路的、騎電動車的老人家們，涵蓋的年齡層之廣，幾乎是老中青幼都有人參與，甚至還有不少其他社區、甚至是別鄉的人，原家中心的社工，陸陸續續出現在活動中心。

隨著現場越來越多人，椅子從四排、五排，越擺越多，一直擺到門邊，擺出門外，椅子不夠了，還有很多比較慢到的人，站在門口，不時探頭往裡面看。

活動中心裡，沒有鮮豔的活動布條，或是豐富獎品的摸彩，被推到一旁的白板上，寫著此刻即將舉行的活動，第一排字是「喘息與生計」，第二行寫著「原住民互助托育的現況與需求」，旁邊還用不同顏色的筆寫下「婦女溝通平台」。

在應當好好休息的週末早晨裡，平和村民和許多外村的人聚集在這裡，等待這場「婦女溝通平台」開始，大家心裡都累積了許多話想說。

自從四月安坡會議後，平和部落的族人也聽到「托育班可能要停了」的消息，社區老人據點的耆老們聽聞托育班遇到困難，他們詢問德布藍恩：「為什麼說我們違法呢？現在政府要我們怎麼做呢？」

德布藍恩平常都是用族語跟長輩溝通，她的母語固然已經非常好，但要講清楚這些政府部會的複雜操作，豈是一件容易的事？

德布藍恩記不清自己嘗試過幾次，但她記得，長輩的表情，從一開始因聽不懂而茫然無神，到有幾個老人家開始會偶爾點頭，她一次次練習，把抽象的書面文字表達給長輩聽。

「公立」和「私立」要怎麼用排灣語講？公立是偉大的人[4]蓋的，私立是有錢的人蓋的。

解釋「建築使用執照」，德布藍恩說那是一張「蓋房子的時候政府會發的證明」，要有這個證明，才可以讓孩子在裡面上課。長輩回應：「我們的房子都沒有！」，

[4] 排灣語中的 irairai，是偉大的人、重要的人的意思，用此來指稱政府。

德布藍恩又無奈又好笑：「對啊，部落的房子幾乎都沒有，我們找不到那樣的房子。」早期的建築並沒有要求要建築使用執照，無論是派出所、活動中心，或者部落裡族人自力建造的房子，沒有一間有建築使用執照。

「政府有出錢，但在法規上他們認為我們的資格不夠，所以托育班現在可能會被停止。」德布藍恩從老人家的眼神中，知道他們聽懂了，「vuvu 們，如果公部門的人來我們這裡，你們要表達意見，長官才會聽進去我們的話。」

托育聯盟擬定的策略之一，是把政府官員從都市的辦公室裡請出來，請他們來社區，實際看見部落的環境，聽到部落族人的心聲，才能明白大家在爭取的是什麼。

然而，中央政務官事務繁忙，又都在北部，政府從片面地宣布要終止托育班計畫開始，也從來沒有表達過要聽大家的想法。就算真的派人來，多半也只能將訊息傳達回去的基層承辦。

要怎麼把長官請到部落裡，成了大家的難題。幸好在向外求救請益的過程中，認識了婦權會的「婦女溝通平台」。地方的社區發展協會可以透過婦女溝通平台，討論各種與性別有關的議題，而政府的相關部會必須派科長以上的公務員來了解。

「vuvu，我們要把長官邀到部落裡，你們用自己的話說！」在婦女溝通平台確定舉辦後，德布藍恩和楊江瑛也陸續邀請了家長、部落長老出來發言，希望從他們的親身經驗，去講述托育班對部落的重要。為了讓長輩能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語講自己的心情，不要勉強用生硬的國語，以及能在第一時間就理解政府官員和外地委員講的話，德布藍恩請部落的兩位長老孫信用、彭富美擔任翻譯，負責將將國語翻譯成排灣語給老人家聽，以及將老人家講的話翻譯成國語。

隨著這場「全排灣語同步翻譯」的溝通平台舉辦的日子越來越近，德布藍恩心中有些忐忑，她知道，對於害羞的部落族人來說，「在長官面前講話」一向是壓力，更何況這次的會議和原民會、教育部跟內政部都有關，一次來這麼多長官。在邀 vuvu 跟家長講話時，她們都害羞的推辭：「我不會講，我會緊張！」

直到會議當天，人潮滿滿的畫面，連德布藍恩都嚇了一跳。部落的族人用實際的行動，表達了他們對托育班的在乎。

「托育班還沒有開始之前，我有一個小小的孫女，我每天、每天都背著他上田裡，甚至在工作的時候，因為她不喜歡一個人在工寮，我是背著 vuvu 在田裡工作……」當初背上總要揹著孫女，啟發德布藍恩動念申請托育班的林秋葉 vuvu，

第一個站起來發言。

「托育班剛開學的時候，我的 vuvu 孫女每天哭，有時候我偷偷到門口看，老師們一個背著、一個抱著、一個揉著，在那裡哄他們。」秋葉 vuvu 遮住眼睛，做出偷看的樣子，又比劃著老師抱孩子的動作，「然後一天一天，他們逐漸習慣脫離 vuvu 的身邊，跟一群小朋友融入團體的生活……」

「因為有了托育班，我有機會在外面工作，也給了我們喘息的機會，我看到的不只是在這裡玩耍或學習，而是接觸我們的文化。」部落裡的年輕媽媽闇美金，她將孩子送到托育班後終於能出去工作，今天特地請假來參加會議。她說：「我承認，我自己的母語也不是很好，當我看到我的孩子，那麼小的孩子會用母語唱歌，我自己都感覺到有一點不好意思……」

在秋葉 vuvu 和美金的發言後，越來越多耆老陸陸續續舉手。

「我們會罵孩子『以前我們是吃地瓜長大的，你們是吃牛奶長大的，你們變成牛了，一定要牽著鼻子才可以走』，因為孩子在長大的過程都不是學部落的東西，他們已經不懂我們的文化。」

「現在我們的孩子終於聽得懂母語，聽得懂我們說的話了，以前我要他拿筷子，他會拿成刀子，因為他們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

「率先作試驗計畫的這個長官，非常的謝謝你，如果沒有你那麼美麗的思維，就不會有托育班。托育班給我們的幫助太多了，我們是一樣的心聲，一定要繼續這個托育班！」

原訂三點就要結束的會議，結果因為太過熱烈，嚴重超時，一路講到太陽西移，將近黃昏。

攤開人民與政府抗爭的漫長歷史，並沒有任何一場行動就能一錘定音的結局，每個改變背後都是漫長累積。這場婦女溝通平台標誌著「集體行動」的開始，未來還會有更多不同介面、不同型態的「溝通」，這是一場需要持之以恆的耐力賽。

對德布藍恩而言，她最開心的莫過於看見部落長輩的行動。她剛回部落時，看見部落族人對政府十分順服，甚至許多不合理、為首長造勢的動員活動，也都忍耐地配合長官的要求。她時常跟老人家說：「我們要做的事，不是要跟隨原民會或原民處的腳步，而是我們真正想要、需要的！」這天，部落的人開始直面長官，為自己發聲，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跨越 104 公里的夥伴

「天涯海角」是指極度遙遠的地方，通常還蘊含著偏僻荒涼，難以抵達的意思。如果身邊有人說他來自「天涯海角」，我們可能會覺得太誇張了吧！畢竟，在我們的日常思緒中，很難想像台灣這座不大的島嶼，真的會有村莊在那麼偏遠的地方嗎？

這個社區，距離平和將近 90 公里，距離美園 104 公里。104 公里有多遠？舉例來說，104 公里可以從台北開到苗栗市中心；或從台中高鐵出發，開到台南的白河夜市，是一段遠遠超出日常移動範圍的距離。而正是一段這麼遠的距離，卻能讓三個社區彼此牽起緣分，在爭取讓孩子留在部落照顧的路途中，成為彼此最重要的戰友。

這個社區，就是屏東縣牡丹鄉的旭海社區。

位於「海角」的旭海社區，究竟有多遠？

如果從台灣西半部出發，要先南下屏東，從國道三號的末端下交流道，繼續走在屏鵝公路上，經過枋寮、枋山、楓港、車城等邊臨台灣海峽的西半部鄉鎮……經過一個小時的路程，直到看見「往四重溪」的路牌，終於左轉進入台 199 縣道。

轉進 199 縣道後，道路的模樣開始改變，從畫著清楚標線的平坦柏油路，開始變成彎彎拐拐、勉強讓兩輛車會車的曲折小路。道路兩旁的景色，也從深藍色的台灣海峽，變成高低起伏的翠綠群山，帶著濃厚的涼意與水氣。

一個小時後，終於從彎彎繞繞的山路駛出，重新看見的海洋已經是不同的藍色。此刻已從中央山脈的末端穿行而出，從台灣西側來到東側，眼前的海洋正是太平洋，還有坐落在太平洋旁的旭海村。

從短暫觀光的視角來看，這樣的遠，帶著遠離日常生活、來到世外桃源的愜意感受。但「遠」也代表生活不方便、不管要去哪裡都要花很多時間……等負面的聯想。不管從哪個角度看，若不是真正身處當中，恐怕都很難完整的去表達，這遙遠的距離，如何形塑生活的樣貌。

因此，旭海托育班的故事，還是得由生活在旭海村的林玉相和謝瑋婷來說。

「旭海像是一個非常大的家庭，幾乎所有人都有親戚關係，社區參訪像家族旅遊，整個社區會一起出去玩。晚餐的時候，整條街都是飯菜香，過節的時候，婦女會一起出來練舞……」這是玉相初來旭海時，對這個村莊的印象。「很慢活，悠哉悠哉的，很適合我。」

玉相成長在台東縣大武鄉大武村，她 24 歲就結婚，跟著先生潘國輝遷調不同地方，她很早就注意到，旭海長大的先生非常戀家，只要經濟許可，每逢休假就會跨過整個台灣島，千里迢迢從台北回旭海，只為住上幾夜。

跟著先生一起回旭海定居後，玉相加入村莊的生活步調，也一邊尋找著適合在社區做的工作。她曾試過擺茶攤、賣剉冰、賣衣服給觀光客，也搭上社區成立「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解說隊的風潮，去考了解說員的證照：「讓自己多一份自信，這個村莊的人、文化你是了解的。」

有些偏鄉地區缺乏正式系統的照顧資源，許多原本並非「照顧專業」的組織，甚至是店鋪或個人，在有意無意間承接起孩子的照顧。玉相還在大武村的時候，就有過在童書店打工，結果從顧書變成顧孩子的經歷。

「老闆一開始是賣童書，他覺得如果對孩子講故事，讓小孩有興趣，就可以賣更多書。很多孩子會留在書店裡，後來有些熟客有托育孩子的需求，書店漸漸變成照顧孩子的『地下幼教』。我的工作也從賣書，變成課輔班助教。」玉相回憶起那段時光：「我帶孩子的方法不是在幼教裡學到，而是從那個書店老闆身上學到的。」

同樣在無意間誤打誤撞，成為「另類照顧者」的，還有跟玉相差不多的時間來到旭海的謝瑋婷。瑋婷成長在牡丹鄉四林村，跟著先生來旭海後，瑋婷在村莊裡一家投幣式網咖顧店。放學後，小朋友聚在店裡想打電腦，網咖老闆規定：「寫完功課的人才可以玩電腦」，瑋婷也因為這個原因，從網咖店員變成孩子的課後老師，陪伴他們完成作業。而這間網咖，後來也變成了旭海社區重要的課後照顧據點——旭海小學堂。

不是幼教專業出身，卻又在生命道路的無意之間，連結起照顧工作的婦女們，在鄉公所推廣的保母訓練課程上，第一次聽到托育班計畫。

和德布藍恩、馬老師一樣，玉相眼前馬上浮現社區的孩子，還有身邊一起參加保母訓練的瑋婷，不正是現成的老師？「可以在自己的社區照顧孩子，並且留在社區工作」的念頭深深吸引了玉相，在得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支持後，便開始準備申請托育班。

「我房子都找到了，老師也有，孩子也有，感覺都沒問題。」起初，玉相以為會很順利，在送件的時候卻先碰了釘子：縣政府承辦的公務員看了計畫書，勸玉相擱置想做托育班的念頭。因為，旭海送件的時間點，要成立托育班，就要花大錢把空間修繕到符合標準，計畫還有可能很快就吹熄燈號，風險實在太大了。

送件失敗後，玉相沒有完全放棄，但也一下子不知道怎麼繼續。幸運的是，當時旭海教會正逢牧師輪調，新來的傳道陳恩惠跟富邦基金會合作，想要找志工來旭海做課輔，認識到在網咖時期就已是非典型課輔班的旭海小學堂，又連上想

要成立托育班的玉相、瑋婷。

「恩惠傳道說，我們是一群『同好』，所以把我們都包在一起，寫成一個計畫。」玉相回憶計畫剛成型時的光景。

用「同好」來形容這群人，有點好笑，但卻又貼切。旭海的照顧圖像，在這番描繪下越來越清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潘旭鴻提供自家的鐵皮屋給教會使用，在這幢屋子裡，上午由玉相、瑋婷做半天的幼兒的托育，下午給旭海小學堂和外地志工作國小課後照顧。

之所以從半天照顧開始，也是恩惠傳道的主意，希望玉相和瑋婷先用一個月一萬元的兼職薪資，從半天開始「試水溫」，讓兩人評估自己是不是真的能適應這樣的工作，也讓孩子、家長開始習慣：自己的社區，有可以托育孩子，讓孩子受到照顧的地方了。

更巧的是，恩惠傳道正是美園部落的族人，和美園的老師再熟悉不過。透過恩惠傳道，旭海與美園托育班連上線，也知道了原本即將被收掉的托育班計畫，在托育聯盟的努力爭取下，得以延續下去。

民國九十九年七月，旭海終於成功申請托育班立案，成為繼平和、美園後，在新制度下的第三間托育班。

旭海的加入，讓平和和美園的老師振奮不已，在托育班剛成立之初，屏東一共十個部落托育班，隨後陸續倒閉，只剩下平和和美園兩個部落苦撐。時隔將近兩年，終於又有新的托育班孕育而出，還是在 104 公里外的夥伴。

玉相形容重新準備立案的這段日子是「去美園取經」，不同於前一次送件未過的茫然，玉相每隔一陣子就到美園討論修改計畫書，觀摩學習經營托育班的各種細節，再回來與瑋婷分享在美園的所見所聞。美園托育班的老師們也整理閒置的桌椅教具，運送到旭海。

在爭取逐漸站穩腳步的過程中，托育班老師要時常到不同地方參與會議，甚至是開記者會抗議。不管是去台北找內政部、教育部；去新莊找原民會，甚至就算只是到屏東市找屏東縣政府，旭海社區永遠要在其他社區的路途基礎上，再加單趟兩個小時、來回四個小時的路程。

「這麼遠，一定要去嗎？」是玉相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每次行動，美園、平和的老師也會體諒的問，旭海這麼遠，如果太累就不用來，沒關係。

「只有一個班，感覺沒什麼力量，好幾個班一起出去，力量就變得很大。」經歷過許多人彼此幫助開展托育班的歷程，玉相深知要繼續走下去，唯有大家一起：「我們也要抓著大家，不是只是被牽著。」

村莊養育的孩子

關於照顧孩子，有一句有名的話：「養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莊。」(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

這句話常見的理解是：孩子的成長不只是父母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共同參與的結果。孩子成長與發展的養分，來自生活環境裡各式各樣角色間的連結。

對於在部落長大的孩子而言，「村莊」是真真實實存在的，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人，以及各種緊密的關係。對於德布藍恩、馬老師、林玉相，還有托育班老師們來說，她們成長的過程裡，充滿著被村莊養育的回憶。

德布藍恩小時候父母在外做生意，經常不在家，便由大姨媽照顧。母親那邊的兄弟姊妹也各自有好幾個孩子，所有表兄弟姊妹加起來有 17 位那麼多。德布藍恩的記憶裡，大姨媽像幼兒園園長一樣照顧所有孩子，家裡總是熱熱鬧鬧，充滿吵鬧聲和嘻笑聲。晚上睡覺時，姨媽家客廳的草席、棉被一鋪好，所有孩子就像做好的香腸堆滿客廳，在棉被裡繼續偷玩 kicikicik(搔癢的遊戲)、玩 nininiku(捉住手指的遊戲)，直到被外公罵才甘心入睡。

「長大後，再怎麼努力回想，也想不起寫功課的畫面，回想起來的，是小時候放學回家，書包一放，跑出去玩的畫面。社區裡有玩不完的遊戲，鄰居都是玩伴，玩 jinduliduli（守護家園）的遊戲、玩蓋房子、模仿五燈獎.....晚餐時間，附近的人都會來問『要不要來我們家吃飯？』，我可以自在地端著碗筷走進任何一家吃飯。」當德布藍恩隨著年紀成長，國中、高中、大學、工作，每個階段都離家越來越遠，但在部落裡生活的童年回憶，為她種下「有一天要回部落」的種子，那是一顆愛的種籽。

馬老師的爸爸是三地村的排灣族，媽媽是美園的魯凱族，小時候的她便在兩邊的部落穿梭。她記得最深的是作為長女的自己，從小就被爸爸那邊的家族長輩以「未來的當家」的態度對待。排灣族文化裡最年長的孩子是未來的當家，晚上大人圍在一起烤火聊天，弟弟妹妹在旁邊玩，但她總會被大人喚去坐在一起，她才國小三年級不到的年紀，但也會被長輩認真詢問她的想法。

「我當時那麼小，聽都聽不懂，哪能有什麼意見？但當身邊的長輩都把我當大人一樣對待，不知不覺中，我就被訓練出一個當家者要有的思維和態度。」對馬老師而言，這樣的文化養成，不可能從任何一堂課或任何一本書裡學習到，「你就得生活在村莊裡，因為這是整個村莊對一個孩子的養成。」

林玉相的爸爸是外省人，小時候在眷村長大，小時候，她最喜歡暑假和一群兄弟姊妹到河邊去偷採西瓜，偷的時候心裡很緊張，但從來都沒有被追過。哥哥告訴她，那已經是收尾階段，瓜農已經不會再管這片田了。

「我爸爸以前是開三輪車的，他會去河邊載瓜田裡剩下的西瓜，他不會把

這些西瓜拿去賣，而是帶回村莊，發給每一家每一戶。」後來她才知道，瓜田裡採剩的瓜留給需要的人，是瓜農與村民不需多言的默契，爸爸的行為也在無形中把互相幫助、彼此分享的習慣留給了她。

當她們成為村莊的照顧者，曾經被村莊照顧的經驗，經常不時從回憶深處召喚出來，一點一滴的在心中流淌。

也正是這些記憶，讓他們在最想放棄的時刻，總有一個念頭支撐著她們下去：希望我們的孩子，也能夠跟我們一樣，成為被村莊養育長大的孩子。

當時間來到民國一百零一年，台灣「幼托整合」政策上路，原本分屬「托兒所」和「幼稚園」兩套照顧系統，全部合併改制為「幼兒園」，主管權責也一併歸到教育部下。對於部落托育班而言，制定政策的部會從內政部兒童局，換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在旭海部落後，托育班又增加了新夥伴——屏東三地門鄉的馬兒部落、泰武鄉的佳平部落，他們都是當年第一批申請托育班的部落，九十八年時因無法符合兒童局的新規範而不能繼續營運，但他們並沒有放棄重新申請，直到民國一百年，終於再次申請成功。

從九十七年到一百零一年，在眾人的努力下，部落托育班從馬上要結束的試驗計劃，努力續命，以「計畫展延」的狀態度過一年又一年，部落也得以在這幾年內繼續維持著托育班，照顧部落的孩子。然而，「托育班只是暫時展延，未來總有一天要收起來」的想法，雖然沒有被明說，卻像是一面刺眼的旗幟，始終掛在眼前不遠的地方。

當幼托整合上路在即，主管單位從內政部換成教育部，對部落而言，對口的公務人員全數更換，意味著前幾年對政府部門所做的倡議工作幾乎歸零，必須從頭開始。

更重要的是，大家隱隱然地知道，這種一年展延一年的狀態，不是長久之計，終究要在最後分出一個明白的結局。

其中一種結局，是托育班只是為了填補偏鄉幼兒需要被照顧、公立幼兒園的收托人數還來拉不上來時，暫時性的過渡方案。當時教育部正如火如荼地在許多偏鄉小學規劃附設幼兒園，一旦這些幼兒園逐一建置完畢，托育班就算達成「過渡性的階段任務」，理所當然的退場。

這個結局，正是教育部在最一開始為部落托育班安排的劇本。當時，教育部國教署的副署長(時任國教司司長)黃子騰，直接點名部落托育班是「因陋就簡」。當時，在教育部眼裡，托育班只適合做為國家資源還沒有到位時，過渡階段的機

制。

如果想撰寫另一部劇本，讓托育班能夠被教育部認可，就必須取得正式的法源依據，部落就必須證明托育班不是「過渡階段、因陋就簡的照顧」，而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部落的立足點在哪裡呢？若要比空間，部落托育班確實比不過國小裡專門為幼兒修繕的教室。除了硬體空間，師資也是教育部認為托育班「因陋就簡」的原因，部落老師多半是技職體系的教保員或保母，而在教育部的觀念裡，大班必須要由修畢教育學程、有教師證的幼教老師授課，才能確保足夠的教學品質。

與教育部協商的過程漫長而沒有盡頭，背後是好幾趟從屏東台北來回，大夥要花費大量時間準備說帖、研讀許多版本的法條，天剛亮就要出門，因為部落距離車站都有一大段距離，光車程移動就人仰馬翻。連堅持十幾年的馬老師，年末帶著幼兒在部落報佳音時，孩子們邁力地唱歌，她卻不禁感到洩氣，這樣帶著孩子在部落走動、報佳音的生活，會不會是最後一次了？

在最疲憊的時刻，平和部落的小米悄悄收成了。

那天，原本都待在托育班隔壁，在文化健康站做活動的老人家，一早走進托育班找老師。

「老師，我們今天要收小米了，你們趕快帶我們的 vuvu 出來！」

老師們接到這個意外的通知，走出教室一看，老人家們已經忙碌的走來走去，有人在廣播叫部落有空的人都下來收小米，有人在活動中心前的廣場鋪開帆布，她們從家裡帶來腰藍，為孩子們一個個繫上。

老人家習慣用小刀砍小米，因為孩子們沒有小刀，老 vuvu 便握著小 vuvu 的手帶示範：「你要這樣做！」小米從田裡收上來後，要將莖整齊砍斷，小朋友蹲在 vuvu 旁，看著 vuvu 手起刀落，驚呼：「vuvu，你在幫小米理頭髮！」

「突擊收小米」的活動洋溢著歡樂的氣氛，vuvu 們告訴老師，他們天剛亮的時候來田裡檢查，才決定當天要收小米。確實很臨時，但大家都說一定要把孩子帶來參加。小孩子不會收沒關係，多看幾次、多做幾次，就能學會了。

「我們不就是為了教小 vuvu 才開始的嗎？」vuvu 對年輕老師這麼說。

這麼多年來，在困頓的時刻，社區永遠是最堅實的後盾。長輩的回饋，大家心中悄然滋長卻一直模糊的「我們的照顧是什麼樣子？」，開始有了更清晰的輪廓。

許多人一起收小米，小孩子在旁邊有人顧著，一邊玩、一邊學習。這是部落過去曾經擁有的生活圖像。

這，也是只有部落做的到的照顧。

天然的農田環境，自然且溫馨的氛圍，實際的工作參與，這些教育不但不會「沒品質」，而是「品質超級好」。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一個在既定規範裡的「專業」、「好品質」幼兒園，所能夠做到的。因為這裡面所有照顧的內涵，都是從部落的文化脈絡裡長出來。

其實，老人家邀請孩子進田裡收小米，在這幾年已經不是常見的事。在德布藍恩記憶中，小米太珍貴，許多老人家會擔心小孩子莽撞，把小米弄倒，同時，也不覺得小米的知識，是孩子需要學習的東西，畢竟學校沒有要考這些。托育班剛成立初期，只有邀請她來回部落當總幹事的老村長孫信用，願意冒著小米苗被踩壞的風險，讓孩子走進田裡。

然而，隨著老師一次次的帶著孩子穿梭在部落的大街小巷，認識每個家戶的長輩，聊他們正在做的工作，聊屋前正在曬的紅藜與小米。當孩子的教導者不是高高在上的「專業老師」，而是能夠拉著部落長輩一起聊天的婦女青年，無形間也拉近部落的人們一起思考：「我們部落的孩子要學什麼」？

當托育班的老師們還在焦頭爛額地思考，如何才能帶著部落走下去時，不知不覺間，部落族人已經走了進來，走到了一起。

背後有部落相挺，給了第一線的老師們更大的勇氣去衝撞教育部既定的想法，甚至在一次協商會議上醞釀了集體離席抗議，站在行政院外頭大聲宣示：

「社區互助，不是過度！」

在民國九十七年的時候，「部落托育班保母實驗計畫」被當成一個嶄新的試驗方案，隨後又被國家系統當成了一個「沒品質」的落日方案。但當照顧重新在部落開始實踐，部落原本的照顧文化便像咸豐草的種子，附著在新的土壤上，重新生根、成長茁壯。

民國一百零一年，幼兒照顧及教育法正式上路，原本的「部落托育班」在幼托整合政策下，轉銜成「部落式與社區式互助教保服務中心」[5]。至此，托育班的名稱走進歷史，「教保中心」取而代之。

---

[5] 幼兒照顧及教育法第十條中，教保中心根據社區環境條件，區分成「社區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和「部落互助是教保服務中心」，其內涵相同，以下皆簡稱教保中心。

「幼兒照顧及教育法第十條」作為教保中心正式的法源依據，並有了設立和營運的辦法，成為公共化托育的一塊拼圖，在地照顧的故事正要開始。